

July 2024

Why Pope Admired the Chinese Gardens: On Lovejoy's "Beauty of Irregularity" and Its Paradox

Yuming Hu
huyuming@nuaa.edu.c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Recommended Citation

Hu, Yuming. 2024. "Why Pope Admired the Chinese Gardens: On Lovejoy's "Beauty of Irregularity" and Its Paradox."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4, (2).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4/iss2/5>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蒲柏何以喜欢中国园林

——兼谈洛夫乔伊的“不规则之美”说及其悖论

胡玉明

摘要:中国造园艺术在英国的影响是与孔子学说的西传分不开的。英国人认为孔子学说与他们的自然神论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反对神的启示,主张向自然学习,中国的孔子学说因其历史久而更胜一筹。经过英国自然神论的文化调适,中国的语言、政治、宗教和艺术都被视为“自然的”。蒲柏认为中国园林是一片“伟大的荒野”,中国园师凭借高超的匠艺再现了自然的“原初状态”和上帝造化的“普遍秩序”。在人工中见自然,这是中国造园艺术与蒲柏的新古典主义共同追求的目标。因此,中国造园艺术之所以能在英国产生深远影响,原因在于它的“自然性”,而不是“不规则性”。

关键词:蒲柏; 洛夫乔伊; 中国园林; 不规则之美; 自然神论

作者简介:胡玉明,文学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与中英文化交流史研究。通信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大道29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211106。电子邮箱:huyuming@nuaa.edu.cn。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园林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项目编号:19YJC752009]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Why Pope Admired the Chinese Gardens: On Lovejoy's "Beauty of Irregularity" and Its Paradox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garden-designing aesthetics in Britain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pread of Confucianism to the West. The British saw several similarities between Confucian philosophy and European deism, as both opposed divine revelation and advocated learning from nature. The former was deemed superior due to its long history. Through the cultural appropriation of British deism, Chinese language, statecraft, religion and art were all seen as "natural." Pope regarded Chinese gardens as "great and wild," and he strongly believed that Chinese garden designers, with their superb craftsmanship, succeeded in reproducing the "primitive state" of nature and the "universal order" of God's creation. Concealing artifice in nature is the common goal that both Chinese garden designing and Pope's neoclassicism endeavor to achieve. Therefore, it was the valorization of "naturalness," not the aesthetics of irregularity, that endeared Chinese gardens to prominent cultural figures like Pope and ensured its broader influence in Britain beyond the debates of the cultural elite.

Keywords: Alexander Pope; Arthur O. Lovejoy; Chinese gardens; beauty of irregularity; deism

Author: Hu Yuming, Ph. 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British romantic poetry 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Address: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29 Jiangjun Avenue, Jiangning District, Nanjing 211106, Jiangsu Province, China. Email: huyuming@nuaa.edu.cn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s Youth Found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YJC752009).

1685年,英国散文家威廉·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 1628—1699年)在《论伊壁鸠鲁

的花园》("Upon the Gardens of Epicurus; or, Of Gardening")中,将中国园林介绍给英国,并用

“Sharawadgi”一词概括中国园林的审美特质(238)。这种新的造园形式受到艾迪生(Joseph Addison)、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年)等文人的推崇,在布里奇曼(Charles Bridgeman)、肯特(William Kent)、布朗(Lancelot Brown)等造园家的作品中得到了印证。进入20世纪,“Sharawadgi”一词的美学意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观念史学派创始人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将“Sharawadgi”解读为一种“不规则之美”,认为这种“不规则之美”促发了18世纪英国的审美转向,成为“一种浪漫主义的起源”(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99)。由于“Sharawadgi”一词的汉语来源尚无定论,洛夫乔伊的“不规则之美”说便成了学界的主流声音,形塑了西方普通民众对中国园林的基本认知。

在18世纪英国文艺界,对中国造园艺术最为热心的非亚历山大·蒲柏莫属。在中国造园艺术的影响下,蒲柏不仅成了英式自然风致园(English Landscape Garden)的理论奠基人,还是这种新园林风格的最早实践者(Liu 101)。他在特威克纳姆(Twickenham)的私人花园就是仿中国私家园林而造的,里面不仅铺设了曲径蜿蜒的羊肠小道,还筑起了“中国的叠石假山和山洞,在英国开了风气之先”(陈志华 352; Walpole 177; Hussey 129)。因此,在讨论英式自然风致园时,很少有人不提蒲柏,洛夫乔伊也不例外。洛夫乔伊在《一种浪漫主义的中国起源》(“The Chinese Origin of a Romanticism”, 1933年)中说:“在反对造园中的对称这一思潮的历史中,蒲柏功不可没。”(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113)在《论诸种浪漫主义的区别》(“On the Discrimination of Romanticisms”, 1924年)一文中,洛夫乔伊还说:“对新古典主义美学的第一个大的反拨根本不是发生在文学上,而是在造园上。”(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240)如果单就造园艺术来说,洛夫乔伊的这两处论断是前后一致、思想连贯的,但是我们知道,蒲柏是英国新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讲究的就是规则和合式。若是把蒲柏的文学家身份考虑进来,洛夫乔伊的论断就变成了:新派造园理论家蒲柏反对新古典主义文学家蒲柏,这就自相矛盾了。蒲柏的新古典主义文学家身份是世所公认的,他对中国园林的推崇也是毋庸置疑的,唯一值得商榷的是,中国园林的审美特质

(至少在蒲柏看来)真的是“不规则之美”吗?

洛夫乔伊的这个逻辑漏洞不是无心之失,而是观念史研究范式的内在弊端所致。观念史研究属于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派别,它的研究路径是将艰深复杂的思想拆解成一个个“单元观念”(unit idea),考察具体的“单元观念”在不同学科、不同国别间的变迁,这就势必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面。继之而起的英国“剑桥学派”对观念史研究范式作了及时有效的修正,认为洛夫乔伊的观念史研究完全是去历史化的,他们强调把思想家的文本放在其所处的思想语境与话语框架中来研究(李宏图 32)。蒲柏的文学生涯主要是在18世纪初,其所处的“思想语境”不仅有新古典主义,还有牛顿定律和自然神论,其中又属自然神论影响最大,几乎当时所有的思想家都是自然神论者。蒲柏的新古典主义美学思想不仅承袭法国,还深受自然神论的影响,尤其是他的《人论》(An Essay on Man, 1734年),处处闪耀着自然神论的光辉。可以说,自然神论和新古典主义主导了18世纪前三四十年的英国审美趣味,它们为中国造园艺术在英国落地生根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基液,中国造园艺术正是在它们的“文化调适”下才得以顺利进入英国,而学界恰恰忽略了这至为重要的一环,直接跳过“文化调适”阶段去讨论中国园林在英国的影响,忘记了英国社会接受中国造园艺术的“初心”。

一、洛夫乔伊的“不规则之美”说及其悖论

洛夫乔伊的观念史研究把浪漫主义作为其理想类型,他的《观念史论文集》(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1948年)就是一部研究浪漫主义的专书,因而最适合它的名字也许是“浪漫主义观念史论文集”。洛夫乔伊的浪漫主义观念史研究的最大创见在于,他把中国造园艺术解读为“不规则之美”,认为这种“不规则之美”成了“一种浪漫主义的起源”,在时间上打破了文学史上对浪漫主义的年代划分,把英国浪漫主义的起始时间提前到1740年,以沃顿(Joseph Warton)创作《自然的钟情者》(The Enthusiast: Or the Lover of Nature)(该书写于1740年,正式发表在1744年)为标志,在空间上割裂了英国浪漫主义与欧洲大陆的思想渊源,表明英国浪漫主义与德、法两国浪

漫主义在审美气质上是不尽相同的,进而证明欧洲浪漫主义不是一场统一的思想运动。可以说,洛夫乔伊的浪漫主义观念史研究是建基于“不规则之美”这一审美假说之上的。

在《一种浪漫主义的中国起源》一文中,为了论证中国园林的“不规则之美”促发了英国从新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审美转向,洛夫乔伊寻章摘句,仅独立成段的引文就多达42处,涉及的方家雅士有23人之多。但是对于蒲柏,洛夫乔伊只有介绍,没有引用,并且介绍蒲柏的这段话也非常简短,简短到只有一个复合句。

在时间上,继艾迪生之后,在反对造园中的对称这一思潮的历史中,蒲柏功不可没,在其针对当时造园实践的最初声明中(见《卫报》,1713年第17期),蒲柏援引坦普尔的观点表示赞赏,他在《致伯林顿伯爵书》(1731年)中很多有名的讨论园艺的段落,读起来就像是对坦普尔的评论的韵文阐释——虽然没有提到中国人。(*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113)

以上这段话就是洛夫乔伊对蒲柏的全部介绍,其中提到坦普尔两次,似乎蒲柏在园艺方面并没有提出新的理念,他的园艺思想只不过是坦普尔的一个注解罢了,也顺带说明了洛夫乔伊没有摘引蒲柏的作品的原因。事实上,蒲柏谈园艺要远比坦普尔深刻与丰富。坦普尔所谈的只是些直观感受和主观想象,而蒲柏的论述却字字珠玑,内含一套缜密的美学思想。在《哥特式建筑的首次复兴和回归自然》(“The First Gothic Revival and the Return to Nature”, 1932年)一文中,洛夫乔伊认为,在18世纪上半叶,英国人对“不规则之美”的喜爱不仅体现在中国园林上,还反映在哥特式建筑和莎士比亚戏剧上,而“蒲柏在理论上,虽然不是在实践中,多少是这三种新潮流的先锋人物”(*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159)。可见,洛夫乔伊是承认蒲柏在园艺方面的理论建树的,认为他在理论建树上是“新潮流的先锋人物”,但他没办法把“新潮流的先锋人物”蒲柏与新古典主义文学家蒲柏统一起来,故而认为蒲柏是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体。换个角度来看,矛盾的或许不是

蒲柏,而是洛夫乔伊。洛夫乔伊或许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不规则之美”说的悖论所在。

在洛夫乔伊构建“不规则之美”说的过程中,他遇到的困难不仅来自新古典主义的蒲柏,还来自英国自然神论的代表人物沙夫茨伯里伯爵(Anthony Ashley Cooper, the 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沙夫茨伯里也是学界在讨论中国造园艺术在英国的影响时经常提及的一位。在《一种浪漫主义的中国起源》于1933年首次发表时,洛夫乔伊在介绍蒲柏的那段话的开头提到了沙夫茨伯里(但没有详细介绍):“在时间上,继艾迪生和沙夫茨伯里之后,在反对造园中的对称这一思潮的历史中,蒲柏功不可没[……]”(“The Chinese Origin of a Romanticism” 11)但是,当该文于1948年收入《观念史论文集》时,沙夫茨伯里的名字被删除了。从洛夫乔伊的表述来看,他是计划把艾迪生、沙夫茨伯里与蒲柏作为一个序列来介绍的,那么是什么让洛夫乔伊思忖再三后决定删除沙夫茨伯里的呢?对此,我们不妨从沙夫茨伯里谈园林的那段话入手,这段话是后世学者反复提及的,因而也可能是洛夫乔伊有意回避的。

我再也不能抑制内心生发的对自然之物的情感,无论是真正的艺术还是人类的自负或任性,都不能侵犯自然的原初状态,破坏自然的内在秩序。即便是粗糙的岩石、长满苔藓的洞穴、未经加工的原始山洞、断流的瀑布,以及所有荒野中骇人的魅力,由于它们更加地自然,也就更加地引人入胜,其宏伟壮观超过了那些豪华花园中的拙劣模仿。(Shaftesbury, *Characteristic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 317)

这段话之所以被反复征引,就因为沙夫茨伯里非常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荒野的喜爱、对几何式花园的反感。问题在于:荒野之美是否就等于“不规则之美”呢?前辈学者在引用这段话佐证中国园林的“不规则之美”时显然是默认这一点的。但是,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毕竟沙夫茨伯里在第一句话中就已经暗示了他喜欢荒野的原因:在他看来,荒野保留了未被人类侵犯的自然的“原初状态”和“内在秩序”。沙夫茨伯里是一位

自然神论者,也被反对派蔑称为“道学家”,他主张美善一体,致力于通过美学恢复社会道德秩序,挽救人的精神生活(朱光潜 229)。因而,他喜欢的是荒野的“原初状态”和“内在秩序”,而非荒野外在的不规则形式。由此可见,洛夫乔伊在文中删除沙夫茨伯里是有道理的,就这一点来说,他比他之后的很多学者看得更为透彻。

于洛夫乔伊而言,沙夫茨伯里与蒲柏代表的不仅是两个个体,更是两股思潮:自然神论与新古典主义。洛夫乔伊在提出中国园林的“不规则之美”说之前,已经对这两股思潮有过专门研究,主要体现在1932年的论文《自然神论和古典主义的相似性》(“The Parallel of Deism and Classicism”)中。在这篇文章中,洛夫乔伊总结出自然神论和古典主义的九个相似之处,其中比较核心的是“均变论”和“世界主义”。“均变论”是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的,它在审美上否定审美的历史维度,认为美是恒常的,古人认为是美的,今人同样会认为是美的,审美对象不会因为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转移,或者说只会发生轻微的调适,不会产生质的改变(*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79-82)。“世界主义”是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的,它不承认审美具有民族性和个体差异,“与普世的理性相符的艺术,很少会屈就于民族及个人的性格或趣味取向”(*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94)。一言以蔽之,自然神论和古典主义在审美上都强调齐一性和普遍性,认为美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是普世的。在蒲柏看来,美之所以是普世的,是因为自然之光(自然规律)是普世的,自然的普世之光“不仅使南方的智趣崇高,且在北方的寒冷中令精神成熟。/阳光起初挥洒远古时代,又照亮当下,还将温暖未来”(qtd. in Lovejoy,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90; *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 Vol. 1 286)。因而,洛夫乔伊说:“蒲柏的文学批评原则与自然神论的宗教原则是一样的。”(*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90)

从洛夫乔伊删减沙夫茨伯里与蒲柏的片段,以及他对自然神论与古典主义审美普世性的探讨来看,洛夫乔伊很清楚这两股思潮是与他的“不规则之美”说相冲突的。沙夫茨伯里和蒲柏是否欣赏中国园林的“不规则之美”暂且不论,单就他们的美学思想来看,他们是不承认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不同审美形式的,他们的美学思想来自古希

腊哲人,即美在比例的和谐,美是有规则的。如此一来,又何谈“不规则之美”呢?因此,洛夫乔伊把中国园林在英国的影响归因于中国园林的“不规则之美”的提法是站不住脚的,至少在18世纪初自然神论和新古典主义在英伦半岛蓬勃发展的这个时期里,这个提法是可以辩驳的。如果中国园林吸引蒲柏的不是它的“不规则之美”,那么又会是什么呢?

二、自然神论与中国造园艺术的西传

中国造园艺术之输往西方与孔子学说的西传大体上是同步的,其标志性事件是《论伊壁鸠鲁的花园》(1685年/1690年)和《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年)的出版。在此之前,有关中国园林与孔子学说的译介比较零散,不成体系,未成风气。尽管坦普尔介绍中国园林比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早两年,但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产生实际影响却是在欧洲社会对孔子学说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具体来说是在18世纪10年代以后。中国造园艺术的西传离不开孔子学说的辅翼。孔子学说在被柏应理等人系统地翻译成拉丁文之后,立马在欧洲产生轰动效应,市场上很快就出现了各种语言的节译本和导读本。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法国人贝尼耶(Francois Bernier)的导读本《孔子与君主之道》(*Confucius ou la Science des Princes*, 1688年)以及坦普尔的散文《论英雄德性》(“Upon Heroic Virtue”, 1690年)。此前,中国在欧洲已经赢得了治国有方、伦理有序、社会稳定的良好声誉,而现在贝尼耶和坦普尔进一步把这些归功于中国君主所奉行的孔子之道,这也是当时欧洲人追慕孔子学说的一个原因。坦普尔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善的,这得益于中国奉行的“为政在人”的治国理念和“德才兼备”的选拔制度,这些都是践行孔子学说的体现。蒲柏在《名人祠》(*The Temple of Fame*, 1711年)中接过坦普尔的话说:“中国有孔子,遗世而独立,教人仁与善,切实且有用。”(*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 Vol. 2 261)

此外,欧洲人在孔子的语录中还发现了很多与他们的自然神论思想不谋而合之处,如“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等。孔子学说彰显了实用理性的特色，它关注的是现实世界，而非鬼神之类的幽冥之界，而欧洲的自然神论也反对神的启示，反对一切超自然、秘术之说，因而他们把中国的孔子学说也称为自然神论，认为孔子学说就是一门顺应自然，向自然学习，建基于自然理性之上的学问。坦普尔说孔子学说就是劝人学习，“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努力提升和完善自己的自然理性，使之达到己所能及的高度，这样他才可能不（或很少）犯错和违背自然法则”（“Of Heroic Virtue” 333）。基于自然理性，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实践上超越了其他人的苦思冥想、欧洲才子的政治蓝图、色诺芬的政体制度、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我们现代作家的乌托邦或海洋国”（“Of Heroic Virtue” 342）。坦普尔颇有洞见地指出，西方自柏拉图以降的政治制度都是人为设计的，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则建立在自然理性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制度是“自然的”、人性化的，用这样的制度管理国家才能实现国民幸福的最大化。

在欧洲人看来，中国的自然神论（孔子学说）历史悠久，它由孔子发扬光大，最早可以追溯到伏羲氏。孔子的诞生早在基督教出现之前，伏羲生活的年代更是比大洪水时期还要早，这就说明中国的自然神论是一种早于基督教的原始的自然宗教，是一种没有经过后世注疏家和神学家妄加评注的原始信仰，保留了自然宗教简单明了、纯任自然的特点。廷德尔（Matthew Tindal）说：“我并不认为孔子和耶稣基督教的格言有何差异，我甚至认为前者简单朴素的语录可以帮助我们阐明后者比较晦涩的指示。”（转引自范存忠 32）博林布罗克（Henry St John, 1st Viscount Bolingbroke）则指出：“自然神论在这个国家[中国]以一种最纯正的形式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264）廷德尔和博林布罗克都是英国著名的自然神论者，同时也是孔学爱好者，他们对孔子学说在英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博林布罗克是蒲柏的圈中好友，他是蒲柏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信息提供者，蒲柏的《人论》中的很多思想就来自博林布罗克。此外，法国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和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也都先后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在很多自然神论者看来，正是中国自然宗教的原始性使之胜过了欧洲的自然神论，因而他们纷纷主张欧洲人向中国学习自然神论思想。

在欧洲人交口称赞中国自然神论（孔子学说）的背景下，法国来华耶稣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写给国内友人的通信集《中国近事报道》（*Nouveaux Memoires sur L'état Present de la Chine*），于1696年在巴黎出版，很快便有了英文、德文、荷兰文等译本。通过李明神父的介绍，欧洲人了解到，中国人不仅在治国理政、伦理道德方面向自然学习，中国的艺术，尤其是中国园林更是师法自然的范本。

中国人很少规整他们的园林，也很少用饰物装扮园林，但不管怎样，他们热衷于造园，也舍得在上面花钱。他们在园林里造岩洞，堆小小的人工假山，他们把石头化整为零运到园林里，再把它们一块块垒起来，除了师法自然之外，不见有其他的设计理念。（qtd. in Lovejoy,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115-116）

在李明神父对中国园林的介绍中，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中国人喜欢造园，但却很少规整、装扮他们的园林，而是竭力呈现园林的“自然性”的一面；其次，早先的欧洲人对中国园林的认知更多的是停留在假山和岩洞上，因为那是中国园林里最具特色，也最吸引欧洲人的地方；最后，李明神父正是根据这些假山和岩洞，得出中国园林“师法自然”的设计理念，“并且正是从这一点[欧洲]开始向中国学习的”（陈志华 343）。后来，“自然性”“假山岩洞”“师法自然”也就成了欧洲人对于中国园林的基本认知。1712年，艾迪生在《旁观者》（*The Spectator*）上连续发表一组名为《想象的快感》（“The 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的散文，他在文中重复了李明神父关于中国园林师法自然的说法，认为“自然的漫不经心的粗粝笔触，比之艺术的精雕细刻和装饰点缀，具有更加奔放和精湛的技艺”（549）。次年，蒲柏在《卫报》（*The Guardian*）上发表文章《论园林》（“On Gardens”），高度赞扬“不加装饰的自然所具有的质朴亲切之美”（*The Prose Works of Alexander Pope* 145），并说“一切艺术都旨在模仿和研究自然”（*The Prose Works of Alexander Pope* 149）。

在孔子学说和中国园林传入欧洲之前，1669

年,英国人韦伯(John Webb)发表了一篇论文《论中华帝国的语言可能是原初语言的历史论文》(“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在这篇论文中,韦伯从中文的象形文字入手,把汉语视为原初语言,也就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使用的语言。结合前面坦普尔、博林布罗克、李明等人对中国政治、宗教、园林的介绍,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在有意无意地把中国描写成那个他们心目中的伊甸园的样子,而中国园林也就成了这种美好想象的最佳投射。可见,中国园林在英国的影响是与英国人对中国的语言、政治、宗教的想象密不可分的,都是建立在中国社会的“原初状态”这一假说之上的,这种原初的自然生活状态是中国园林在英国受到追慕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早先的欧洲人对中国园林的认知主要局限在园林假山和岩洞上。与此同时,欧洲人脑海中联想最多的便是欧洲园林中的绿色雕刻,即把植物修剪成人或动物的造型。两相对比,西方园林里的绿色雕刻与中国园林里的假山岩洞的区别似乎是审美形式问题、规则与不规则的问题,其实不然。中国园林里的假山岩洞引起欧洲人注意并不是因为它们是不规则的,而是因为它们相比欧洲的绿色雕刻更加地自然。同理,当培根(Francis Bacon)在说“绝色者之形体比例定有异处”(163)时,他也绝非强调绝色者之形体的不规则性,而是说形体美要符合身体发育的自然规律。类似的例子在洛夫乔伊的《一种浪漫主义的中国起源》中还有很多,它们所佐证的与其说是中国园林的不规则之美,不如说是中国园林的自然性。

“自然性”是中国园林与欧洲园林的区别所在,但是让西方人倾慕中国园林的却是“自然性”背后的神性。艾迪生在《想象的快感》中说:“神赋予我们周遭事物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能唤起我们想象的快感;所以我们不可能目睹神的作品而漠然无动于衷,也不可能环视众多美好的事物而不感到一种神秘的快感和满足。如果我们静观万物只见其形态和运动,万物的外观也就贫乏得可怜。”(546)在艾迪生看来,自然本身并不是美的,是神赋予了自然一种可以激发我们的快乐想象的能力,这种能力让我们感受到美,也就是说,神才是

一切美的来源。艾迪生称自然美为人感觉到的“一种神秘的快感和满足”,这同他对“Sharawadgi”之美的阐述如出一辙:“一种一见就令人遐想,却不知如此愉悦效果之所以然的美景。”(552)艾迪生有关自然美的观点与沙夫茨伯里是相似的,沙夫茨伯里把自然美视为“第一性美”(神)流溢的结果(朱光潜 235)。如前文所示例,沙夫茨伯里钟情于荒野,但他似乎对中国园林并无好感,他曾暗示在包括中国园林在内的所有中国艺术形式中,找不出一种“不比哥特式更糟糕的”(Second Characters, or The Language of Forms 105)。沙夫茨伯里之所以有这种极端的看法,源于他对中国自然宗教的态度,他认为中国的自然宗教不是真正的宗教,而是异教(Characteristic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 154)。这样一来,中国园林也就失去了“第一性美”的眷顾,因而不是美的。

三、中国园林与蒲柏的新古典主义思想

经过英国自然神论的文化调适,中国园林向英国人传递的是一种顺应自然、师法自然的自然美。1725年,蒲柏在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谈到了中国园林,他说:“对于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居鲁士的乐园(Paradise),以及中国的 Sharawadgi 园林,我知之不多,没有什么概念[……]但它们一定非常伟大、非常荒野化(both very Great, and very Wild).”(The Correspondence of Alexander Pope 314)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居鲁士的乐园,以及中国园林都是坦普尔在《论伊壁鸠鲁的花园》中分别介绍过的,它们对于蒲柏来说都是陌生的,给他留下的印象也是一样的。空中花园传说是公元前6世纪古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为缓解王妃的思乡之情,仿造王妃在山上的故乡为其修建的,居鲁士的“乐园”(波斯语)是英语单词“天堂”(Paradise)的来源,它们对于我们的陌生程度与300年前蒲柏感受到的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在脑海中简单勾勒一下这两座花园的样子,就不难理解何以蒲柏以及同时代的英国人会把中国园林想象成一片“伟大的荒野”,其中充满了梦幻色彩、钦羡之情,而无贬损之意。

英国人酷爱荒野,视荒野为上帝的杰作,里面保存了上帝造化的“原初状态”和“普遍秩序”。尽管英国自然神论反对神的启示,但不否定神的

存在,并把一个各从其类、运行有序的自然界作为上帝存在的合理性理据。自然神论者喜欢把自然比喻成一个做工精良、永不停歇的钟表,犹如每个钟表背后都有一位手艺精湛的工匠一样,充满秩序和目的性的大自然的背后也肯定隐藏着一位无限智慧的造物主。“在自然界中,上帝不再以超自然的奇迹方式(所谓奇迹就是上帝用自由意志来任意中断自然规律)出现,他的身影和声音都从自然界中消隐了,但是他的智慧却体现在自然界的秩序、和谐与美之中。”(赵林 88)这种类比推理的方法被蒲柏运用到《人论》中以证明上帝的正义和宇宙的和谐。蒲柏说:“整个自然都是艺术,不过你不领悟;一切偶然都是规定,只是你没看清;一切不协,是你不理解的和谐;一切局部的祸,乃是全体的福。/高傲可鄙,只因它不近情理。/凡存在的都合理,这就是清楚的道理。”(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 Vol. 3, Part 1 50-51; 王佐良 142)蒲柏在这里把上帝比喻成一位艺术家,整个自然界都是他的艺术作品,这件艺术品是完美无瑕的,一切看似不协调的都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和谐。

新古典主义者都是尚古者,在18世纪初的英国,尚古思想不仅体现在艺术上,也体现在对自然的态度上,新古典主义者不仅认为今人的作品不如古人,而且认为今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也不如远古时代的自然。自然越荒芜越好,越荒芜离上帝创世时的“原初状态”就越接近,越少受到人为的改变,被人为干预的自然也会随着人的堕落而变得衰败。因而,在当时的很多艺术家看来,“伟大的艺术设计就是要通过恢复秩序,修复因人的原罪而带来的人性堕落和自然衰败”(Dennis 336)。要“恢复秩序”,在蒲柏看来就是要师法自然,师法自然未被人人入侵前的“原初状态”,“要信奉自然,照它正确的规范,用始终如一的规范,制定你的判断。[……]她是艺术的准绳,又是根源和目的”(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 Vol. 1 246-247; 缪灵珠 17)。古人生活的年代离这种“原初状态”最为接近,其作品是这种“原初状态”的最佳展现,因而蒲柏说师法自然就是师法古人。蒲柏在信中将中国园林与公元前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居鲁士的乐园并置,也是这种尚古论的自然观在起作用,认为中国园林是古人师法自然的杰作,很好地保留了远古时代自然的荒野状态。

“师法自然”是蒲柏新古典主义思想的内核,这与法国的新古典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虽然都提倡向古人学习,但是侧重点不同。蒲柏倡导学习古人师法自然的精神,他说:“古老的规则是古人发现而非设计的,它们本身还是自然,不过是依照自然梳理出来的。”(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 Vol. 1 249)可见,在蒲柏这里,师法古人只是手段,师法自然才是目的。但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布瓦洛(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则强调师法古人的章法和程式,他本人立志要为法国文学创造规则和制定方法。蒲柏与布瓦洛持有异见是有原因的。布瓦洛的新古典主义是法国君主专制政治在文艺上的体现,与法王路易十四志行整饬、建章立制、统一思想的政治目的是一致的,犹如法国的古典主义园林一样,都是为这种极权政治服务的,布瓦洛也因此获得了法王路易十四的赏识。与之不同,此时的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英国自然神论思想应运而生,它不仅把上帝从自然界中请了出去,也把国王从社会政治中请了出去,上帝和国王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太上皇”。因而,蒲柏的新古典主义不是为某种专制政治服务的,而是为建立一种自由政体服务的。这里,“自由”不再是反“专制”的,而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诚如蒲柏所言:“自然,正像自由,要支配它只能根据自然本身起初所立下的那些规律。”(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 Vol. 1 249; 缪灵珠 18)培根所说“知识就是力量”也是这个意思,即借服从自然去征服自然。因此,蒲柏的新古典主义不单袭自法国,还有来自英国自然神论的影响,后者甚至是更为主要的,毕竟蒲柏在《批评论》中是通过自然树立古人的至高地位的,即古人的伟大在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是伟大的。

“师法自然”不仅让蒲柏有别于法国新古典主义者,也让他有别于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模仿论者。当维吉尔说“荷马与自然实为一体”时(Pope, 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 Vol. 1 255),他指的是荷马对人物的刻画入理切情,符合人物性格,当莎士比亚说戏剧“仿佛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77)时,他指的是戏剧应该反映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而在蒲柏的文艺思想中,“自然”一词不仅含有这些意思,更是指我们日常所说的大自然。蒲柏提升了自然在文学中的地位,他和艾

迪生都认为自然高于艺术,艺术应该“师法自然”。但是艺术要向自然学习什么呢?这中间起桥梁作用的正是造园艺术。蒲柏把自然比喻成一位姑娘,造园时“既不可过分装饰,也不可不挂一丝”(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 Vol. 3, Part 2 138)。蒲柏把造园上的这条原理运用到文学批评上,反对文学中的奇思怪喻:“有的诗人只偏爱奇思怪喻,/巧妙的构思突出于每行诗句。/满足于异想联翩和巧喻堆砌,/那样的作品不恰当也不合适。”(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 Vol. 1 271-272;王佐良 141)如果说造园上的“师法自然”是为了再现自然的魅力,那么在蒲柏看来,文学上的“师法自然”就是要体现语言的魅力,即利用语言修辞和诗文炼字来表情达意,“写的是平常思想,但能言人所难言(What oft was Thought, but ne'er so well Exprest)”(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 Vol. 1 273;王佐良 141)。在此,蒲柏强调的是“言人所难言”,而非“言所未言”。在蒲柏看来,诗歌的优劣不在于思想的高深,而在于语言的精练,诗歌的“自然性”也就体现在诗人高度凝练的语言魅力,而一切“奇思怪喻”只能是弄巧成拙。蒲柏的《批评论》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批评论》中新见不多,但妙语连珠,名句迭出。蒲柏的贡献在于他赋予了新古典主义以“自然”的特色,这也是后来英国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凡事都以贴近自然为宜,凡是符合自然的,就是符合神意的,符合人性的。

“师法自然”并不否定人工和艺术,而是要通过高度的人工性建构自然性。在这一点上,中国园林与蒲柏的新古典主义思想有着高度的契合,前者通过造园师的高超匠艺再现了自然的魅力,而后者通过诗人的锤文炼字展现了语言的魅力,二者体现的都是高度人工化后的自然性。为了展现艺术的自然性,人工巧艺必须隐而不露,那些“遍用金玉铺砌”的诗章恰是“借装饰点缀掩盖艺术的无能”(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 Vol. 1 272)。以高度的人工性建构自然性,这不仅是 中国园林与蒲柏文学批评的契合点所在,也是包括坦普尔在内的英国新古典主义作家对中国造园艺术的共识。坦普尔在介绍中国园林的审美特质时说:“中国人在园林设计上发挥了超乎寻常的想象力,那是一种伟大的夺人眼球之美,却轻易看不出任何人为设计、匠心布局的痕迹(without any

order or disposition of parts, that shall be commonly or easily observed)。对于这种美,我们还没有一个明晰的概念,但他们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形容它。”(“Upon the Gardens of Epicurus; or, Of Gardening, in the Year 1685” 237)这两句话很重要,洛夫乔伊正是基于此把中国园林的美总结为“不规则之美”(without any order)。但是,“order”一词可以有多个意思,坦普尔为了让读者正确领会他的所指,连用了两个词“order”和“disposition”,二者相互制约,它们的共同指向才是坦普尔所要表达的意思,即人为“安排”(arrangement)。因而,坦普尔用“without any order”是为了表达中国园林的美是一种非人为刻意营造的美,而不是洛夫乔伊所理解的“不规则之美”。坦普尔之后,艾迪生与蒲柏也正是在这个意思上认识中国园林的。

结 语

中国造园艺术在英国的影响是与孔子学说的西传分不开的。在欧洲人看来,孔子学说就是一种自然神论,一种顺应自然、师法自然的学说。“师法自然”不仅是中国哲人治国理政的法宝,也是中国园师造园布景的准绳。在英国自然神学家看来,自然是有秩序的,也是可以认识并加以模仿的。师法自然不排斥艺术,也不排斥人工,而是力求在人工中见自然,但是师法自然却反对过分装扮自然,因为自然是完美的,自然高于艺术。因此,中国造园艺术得以在英国扎根发芽得益于它的“自然性”,在于中国园师以高度人工性建构的自然性,这种自然性是以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的,而非外在不规则的自然形式。“不规则”只是一种表象,它不是英国人追慕中国园林的原因,因为“不规则之美”既不符合那个时代有关美在规律性、美在完满的审美原则,也不符合那个时代旨在追求普世性的时代精神。

否定中国园林的“不规则之美”说,并不是要否定中国园林在英国的影响。中国园林在英国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中国园林“师法自然”的设计理念让自然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得以进入欧洲美学的审美范畴,进而催生了伯克(Edmund Burke)的自然美学,在英国开辟了一条不同于欧洲大陆以造型艺术(温克尔曼)和绘

画艺术(莱辛)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美学新路径。其次,在经过一个世纪的园林改造和理论建设后,中国的“自然”观念在英国人心中已经扎下了根,这种“自然”观念已经超过了审美的范畴,渗透到英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一切皆以自然为准绳,只要是符合自然的,就是符合人性的,就是美的、善的,进而确立了英国自然主义的民族性特征。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Addison, Joseph. "The 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 *The Spectator*. Ed. Donald F. Bond. Vol. 3.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65. 535 - 582.
- 弗朗西斯·培根:《培根随笔集》,曹明伦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
- [Bacon, Francis. *Collected Essays of Francis Bacon*. Trans. Cao Minglu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21.]
- Bolingbroke, Henry St. John. *The Works of Lord Bolingbroke*. Vol. 4.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7.
- 陈志华:《外国造园艺术》。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
- [Chen, Zhihua. *Foreign Garden-Designing Art*.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1.]
- Dennis, John. *The Critical Works of John Dennis*. Ed. Edward Niles Hooker. Vol. 1.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39.
- 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
- [Fan, Cunzhong. *Chinese Culture in Britain during the Period of Enlightenment*. Nanjing: Yilin Press, 2010.]
- Hussey, Christopher. *The Picturesque: Studies in a Point of View*. Hamden: Archon Books, 1967.
- 李宏图:《观念史研究的回归——观念史研究范式演进的考察》,《史学集刊》1(2018):29—39。
- [Li, Hongtu. "A Return of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Ideas: An Examin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Paradigms in the Research." *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 1 (2018): 29 - 39.]
- Liu, Yu. "The Inspiration for a Different Eden: Chinese Gardening Ideas in England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Review* 53. 53 (2005): 86 - 106.
- Lovejoy, Arthur O. "The Chinese Origin of a Romanticism." *The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 32. 1 (1933): 1 - 20.
- .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60.
- 缪灵珠:《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二卷),章安祺编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 [Miao, Lingzhu. *Collected Translations of Aesthetic Writings*. Ed. Zhang Anqi. Vol. 2.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1998.]
- Pope, Alexander. *The Correspondence of Alexander Pope*. Ed. George Sherburn. Vol. 2.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56.
- . *The Poems of Alexander Pope*. Ed. John Butt. 11 Vols.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61 - 1969.
- . *The Prose Works of Alexander Pope*. Ed. Norman Ault. Vol. 1.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8.
- 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Characteristic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 Ed. Lawrence E. Kle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 *Second Characters, or The Language of Forms*. Ed. Benjamin R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4.
- 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卞之琳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
- [Shakespeare, William. *Hamlet*. Trans. Bian Zhilin. Hangzhou: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1.]
- Temple, William. "Upon the Gardens of Epicurus; or, Of Gardening, in the Year 1685." *The Works of Sir William Temple, Bart*. Vol. 3. London: Printed by S. Hamilton, 1814. 202 - 245.
- . "Of Heroic Virtue." *The Works of Sir William Temple, Bart*. Vol. 3. London: Printed by S. Hamilton, 1814. 313 - 405.
- Walpole, Horace. *The Yale Edition of Horace Walpole's Correspondence*. Ed. W. S. Lewis. Vol. 2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王佐良主编:《英国诗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 [Wang, Zuoliang, ed. *Selected English Poetry*.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1.]
- 赵林:《英国自然神论初探》,《世界哲学》5(2004):86—93。
- [Zhao, Lin. "A Study on British Deism." *World Philosophy* 5(2004): 86 - 93.]
-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 [Zhu, Guangqian. *A History of Western Aesthetics*. Vol. 1.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责任编辑:黄金城)